



政治的他者

曹卫东 著

曹卫东说美国大学模式影响我们，一种是美国的大學模式，另一种是苏联的大學模式。现在我们在追求美国模式，于是有很多大学又来了一个边倒，把美国的大學模式当成了学习的榜样。我们要思考的是，美国的大学可以照它自己的那种方式办吗？可能办不好，甚至会很坏，但我们如果也用这种方式来办大学的话，那办得好吗？这是一个问题。要从本土出发来办大学，我想大学也就应该是本土的，要充分考虑我们大学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才，本土的发展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积极作用。所以，大学制度要不断地创新，就是重新思考教育本身的意义。

中国法制出版社
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



政治的他者

曹卫东 著

中国法制出版社
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

责任编辑：罗洁琪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政治的他者/曹卫东著. —北京：中国法制出版社，
2007. 2

(法政学思)

ISBN 7 - 80226 - 680 - 7

I. 政… II. 曹… III. 法学 - 文集 IV. D90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63249 号

政治的他者

ZHENGZHI DE TAZHE

著者/曹卫东

经销/新华书店

印刷/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/880 × 1230 毫米 32

印张/7.75 字数/123 千

版次/2007 年 10 月第 1 版

2007 年 10 月印刷

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

书号 ISBN 7 - 80226 - 680 - 7

定价：18.00 元

北京西单横二条 2 号 邮政编码 100031

传真：66031119

网址：<http://www.zgfzs.com>

编辑部电话：66022958

市场营销部电话：66033393

邮购部电话：66033288

曹卫东

江苏阜宁人，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，中国社会科学院，德国法兰克福大学；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；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、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、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、德国普莱斯纳学术会员等。著有《交往理性与诗学话语》、《中国文学在德国》、《曹卫东讲哈贝马斯》、《思想的他者》等，编有《霍克海默文集》、《哈贝马斯文集》（第一、二卷）、《欧洲为何需要一部宪法》等；译有《后形而上学思想》、《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》等。



目 录

目次

一 1

一

从“Seres”、“Kitai”(Cathay)到“Tschina” 3

德国讽刺书札中的中国形象 19

哈勒和维兰的中国观 27

二 39

二

法的历史性与有机性 41

社会激进主义批判 58

阿多诺早期思想星丛：阅读笔记 77

夜读偶记 102

三

117

现代性：问题还是主义？	119
进步观念批判	128
自由主义、社群主义与正义问题	135
“欧罗巴必须是文化的”	142
大学教育与文化认同	147
数字化幽灵与中国学术评价制度	159

四

165

哈贝马斯之缘（一）	167
哈贝马斯之缘（二）	175
文学语言与文学本质	188
哈贝马斯思想的全景展示	199

五

203

《合法化危机》编者前言	205
《曹卫东讲哈贝马斯》后记	208
《霍克海默集》后记	212
《启蒙辩证法》前言	216
《欧洲为何需要一部宪法》序言	219

附录	225
----	-----

德语世界的鲁迅研究	227
那山 那水 那酒	238



—

- 《「Seres」, 「Kital」 (Cathay) 到「Tschina」》
- 《瀛国讽刺书札中的中国形象》
- 《哈勒和维兰的中国观》

从“Seres”、“Kitai”(Cathay)到“Tschina”

——德国文学中的“中国形象”
史前史研究

从西方与其外部世界（非西方）的关系着眼，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（Arnold J. Toynbee, 1889—1975）在其《历史研究》（A Study of history）这部巨著中认为，应当把西方现代的开端安置在十五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里。^{〔1〕} 汤因比对现代的发生作这样的处理，主要是出于“内”和“外”两个方面的考虑：从“内”看，直到十五世纪，西

〔1〕 汤因比：《历史研究》（下卷），曾未风等译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7年版，第181页。

方人才开始把脚步探出基督教教规的重重钳制，走出长达四个世纪之久的中世纪，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宗教的束缚和上帝的庇荫，得以把观察的视界由天上拉回到人间，开始真正关注人类自身；就“外”而言，西方人在十五世纪已经准确地掌握了远洋航海技术，这就使得他们能够想方设法克服地理和物理上的障碍，飘洋过海，探访地球上一切有居民的和可以居住的陆地。而在这项成就为西方基督教文明所掌握之前，西方旧世界文明与新大陆文明之间可以说很少有直接的接触，甚至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往来。因此，远洋航海不但是促成西方人把目光投射到西方以外世界的直接条件，由此真正开始了西方与其外部世界的相互接触，揭开了西方与非西方（包括东方）之间的关系史；而且同时，它也是一块鲜明的历史界石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，以便我们研究中西文化关系。所以，从严格意义上讲，中西文化关系的发生也应该定源于此时此刻，中德文化关系也自然不能例外，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萌芽、发展，并逐步走向复杂和深化的。

一、中国形象的史前史

汤因比在确立西方现代开端的同时还明确指出，西方于十一世纪开始进入中世纪，其间曾发生过震天动地的“十字军东征”（Kreuzzüge）的历史事件。所谓“十字军东征”，通常是指西方的几次军事远征。当时，在教皇的鼓励和祝福下，西方进行了这些带有神圣色彩的远征，旨在去

争取、支持或再一次争取在耶路撒冷建立一个基督教王国。^{〔1〕}“十字军东征”对东西方文化关系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，使得中世纪的西方与其周邻世界开始直接照面并有了初步的接触，也使西方通过其周邻世界对遥远的东方有了间接而朦胧的了解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西方于隐约之中感觉到了东方古国中国的存在，中国形象随即在西方文学作品特别是德国文学作品中露出端倪。因此，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，在真正进入中西文化关系之前，还存在着一段比较模糊却又值得重视的中西文化关系史前史。而就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而言，这段时期则可以称为“中国形象”的史前史。

我们不妨先把视野放宽一些，回到西方文化的源头。我们注意到，其实大约早在古希腊时期，中国就已经作为一个神秘的国度存在于欧洲人的意识当中了。到了罗马时期，欧洲人对中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，称中国为“Seres”（赛里斯）。据有关学者研究，“Seres”一词可能由汉语“丝绸”中的“丝”字转化而成，此后沿用了若干世纪。当然，西方人当时称中国为“赛里斯”（Seres），与其说是出于想象或判断，毋宁说是纯属猜测。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，西方人要想准确地断定出中国人的地理位置和民族特征，显然是难乎其难的。而把中国人描绘成“红头发，蓝眼睛，粗嗓子”等这样令人忍俊不已的形象，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，毕竟，我们在早先的时候也是这样来想象和描

〔1〕 汤因比：《历史研究》（下卷），第228页。



述那些非我族类的。

现在我们再回到德语世界。大约在公元 1000 年左右，诺特克尔·托伊托尼克尔（Nother Teutonikus）在其关于波伊提乌（Boethius，约 480—524）的评注著作中首次提到了“赛里斯人”，并称之为“异教徒”。1190 年，受萨克森和巴伐利亚的大公海因里希·勒弗（Heinrich der Loewe，约 1129—1195）的委托而出版的《卢西达留斯》（Lucidarius）和鲁道夫·冯·埃姆斯（Rudolf von Ems，生卒不详）大约于 1240 年出版的《世界编年史》（Weltchronik）也都提到过“赛里斯人”。但不管是托伊托尼克尔，还是埃姆斯，他们都是严肃的学者，其著作都是学术性的，所注重的也是文献记载，和文学虚构还不是一回事。但这里也必须指出，托伊托尼克尔称中国人为“异教徒”，显然是出于宗教考虑，带着很重的神圣色彩，与当时的历史氛围自然有着深刻的联系，可谓是开创了救世史意义上的中国形象的先河。

“赛里斯”一词最早进入德国文学想象领域，成为德国作家笔下的艺术素材，是源于中世纪宫廷史诗作家沃尔夫拉姆·冯·艾森巴赫（Wolfram von Eschenbach，约 1170—约 1220）的史诗《帕尔齐法尔》（Parzival）和《威廉》（Willehalm）。但是，在诗人沃尔夫拉姆心目中，“赛里斯”只是一个名称（Name），或者说只是一种装饰。至于诗人为何要选用这个名词来作为自己诗作中的点缀，我们不得而知；不过，可以肯定的是，“赛里斯”这个名称在此时此刻还没有什么深刻的涵义或特定的所指。

到了中世纪后期，德国出现了一部详细描写中国的游记作品，模仿的是英国作家曼德维尔（Sir John Mandeville，约1300—1372）所著的《东方闻见录》（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）。德国的这部游记作品，其作者已不可考，是一部虚构作品，也是一部杂烩之作，广采有关东方的资料加以编撰。^{〔1〕} 值得重视的是，中国在其中已不再被叫做“赛里斯”，而是被冠之以“契丹”（Kitai）。由于曼德维尔的作品在当时流传极其广远，“契丹”一词在德语语境中便也渐渐地深入人心，广为人知。

“契丹”一词在德语世界里虽然被广泛地使用开来，但比较有趣的是，当时几乎没有人能搞清楚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：即“契丹”就是“赛里斯”，两者指代的是同一个国家：中国。人们不是把两者说成是两个不同的国家，就是称中国的北部为“契丹”，南部为“赛里斯”，而又不能把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。不过，需要指出的是，人们对“契丹”的认识和了解较之于“赛里斯”，在深度和广度上的确都增进了许多，比如，人们知道了“契丹”的君主叫“可汗”（Great Khan）。诗人汉斯·罗森普吕特（Hans Rosenpluet，约1400—1460）的《葡萄酒颂歌》（Weinsegen）一诗便是一个极好的例证：

上帝赐福于你，名贵的酒药！

〔1〕 Raymond Dawson: 《中国变色龙》（The Chinese Chameleon-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），London，1967年版，第23—25页。

你使我健康强壮，
因为你是一个健康的 Syropel。
君士坦丁堡的皇帝，
契丹国伟大的可汗和
教皇约翰，这三位巨富；
连他们用钱都买不来你的价值，
难道我还会指责你吗？

这首诗中不无幽默与调侃。在罗森普吕特看来，“契丹”犹如君士坦丁堡，是一个充满东方情调和传说色彩的陌生国度；而“契丹”的君主“可汗”堪与君士坦丁堡的皇帝、教皇约翰鼎足而三，成为传说中的巨富之一。

二、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中的中国形象

正如德国学者哈拉尔德·布洛伊纳（Harald Bräuner）所指出的，曼德维尔只是“契丹形象的传播者；真正的塑造者应是其他的两位旅行家，即威廉·鲁布鲁克（Wilhelm Rubruk）和马可·波罗（Macao Polo）”，^{〔1〕}其中又以马可·波罗更为突出。

瑞士著名历史学家雅各布·布克哈特（Jacob Burckhardt, 1818—1897）在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》一书中指出，十字军东征不仅在思想观念上为欧洲人打开了远方未知的世界，从而引发了许许多多有关远方陌生国度

〔1〕 Harald Bräuner: 《异国与现实》（Exotik und Wirklichkeit），München，1990年版，第15页。

的幻想和猜测，而且更在实践方面唤起了西方的旅行冲动和冒险热情，激起了人们对于异国他乡做实地考察和亲身认知的无穷欲望。冲出欧洲大陆，走向外部世界，寻求新的发现，成为当时的一股热潮。^{〔1〕} 我们稍作深究，便会发现，这股热潮的根本动机其实还是在于“求知”，具体表现为对地理知识的发现和对物理知识的获取，当然，也不排除对文化知识的好奇和猎取。

在这股热潮中，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，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，的确无与伦比。但马可·波罗同样堪称是一位“佼佼者”，否则，布克哈特也不会称赞他是当时最富有进取精神的人：

世界的另一半就好像新发现一样，展现在他面前。他被卷入了蒙古人的洪流中，被带到大可汗的朝廷上去。^{〔2〕}

因此，就中西文化关系乃至中德文化关系而言，马可·波罗或许才是一位“真正的发现者”。按照布克哈特的理解，“真正的发现者不是那个第一个偶然碰到任何东西的人，而是那个找到了他所寻找的那个东西的人”。^{〔3〕} 就此而言，马可·波罗显然当之无愧。

在汉语世界中，马可·波罗并非陌生角色，甚而带着某种神话色彩。他出生于1254年的威尼斯，他的家庭是富

〔1〕 布克哈特：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》，何新译，商务印书馆，1988年版，第280页。

〔2〕 布克哈特：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》，第280页。

〔3〕 布克哈特：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》，第281页。

商与旅行世家的结合体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追求地理上的发现和致力于物理上的赢利，在马可·波罗家族身上得到了较为完美的体现，并且是那么得相融和一致。早在马可·波罗之前，他的父亲尼古拉·波罗（Nicola Polo）和叔父马菲·波罗（Mafeo Polo）就曾经涉足过元朝中国的领地，一度还非常深入。马可·波罗就是在这两位前辈的带领下到达中国的，具体时间是1275年6月。当时，马可·波罗年仅21岁。聪明伶俐的他深得元朝大可汗忽必烈（Kubilai）的赏识和喜欢，并多次受忽必烈的派遣而出使国内外。马可·波罗在中国滞留长达二十年，可谓前无古人。直到1295年，他才重新回到久违了的故乡威尼斯。

在中国长时间的滞留，与最高层当权者直接的接触和密切的交往，所有这些都使得马可·波罗的东方之旅蒙上了一层诱人的神秘色彩，他本人也成了一个传奇人物。回国3年后，马可·波罗在威尼斯与热内亚的战争中不幸沦为阶下囚。在狱中，他的海外奇闻、东方奇遇引起了同狱的小说家比萨的茹斯提切罗（Rustichello of Pisa）的极大兴趣。于是，一部伟大的游记，在马可·波罗的口述和罗斯蒂奇罗的笔录之下诞生了，让后人受益匪浅。

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问世后，被不断辗转翻译成各种文字，并且被反复校勘和注解。大体而言，这部游记可分为两大部分：第一部分讲述马可·波罗个人的成长历史，第二部分记载他所到过的各地的情形。我国学术界通常把这部游记分为四卷，第一卷记载马可·波罗等东游沿途所见所闻，直至到达上都为止。第二卷所记内容比较繁复，主